書籍評論

《廣州的中國人》——花旗旅人粵海聞見錄

何思兵 *

摘　要 美國旅人替分尼於1844年來華遊歷，通過與當地居民直接交往，探究粵海民俗風情。他在1849年出版的遊記《廣州的中國人》的前言中，開宗明義地道出了寫作此書之目的：“中國人是個出色的民族，卻被不公平地貶低了，我希望能竭盡綿薄，為我的同胞提供更確切的訊息。”作者以其細膩的筆觸和浪漫的情懷，勾畫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南粵市井風情寫生。本文扼要地評介這本遊記，並將該書有關粵港澳風土人情以及鴉片貿易的內容節譯出來，以饗讀者。

關鍵詞 廣州；澳門；香港；鴉片貿易；跨文化反思

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5 月，21 歲的美國青年替分尼(Osmond Tiffany, Jr., 1823–1895) 乘坐三桅商船“先驅者號”從巴爾的摩(Baltimore) 前往中國，經過四個多月的艱辛航行，於同年 9 月到達廣州。在清代道光年間的文獻裡，美國的譯名通常為“花旗國”或“咪唎㖞”，美國人被稱為“花旗人”或“咪夷”。這位花旗旅人在廣州停留了四個月，其間曾到香港和澳門遊覽，後於 1845 年農曆新年前夕離穗返航。替分尼到廣州，並無商務在身，純粹為旅遊觀光和搜集寫作資料。回到巴爾的摩後，他一邊經商，一邊撰寫他的粵海聞見錄。四年後，替分尼在波士頓出版了《廣州的中國人：一位美國旅人對天朝帝國的觀察》，[1] 時年 26 歲。1862 年，《廣州的中國人》改名為《美國人在中國》，在波士頓再次出版。[2] 在這本遊記的前言中，他開門見山地道出了寫作此書之目的：

> 中國人是個出色的民族，卻被不公平地貶低了，我希望能竭盡綿薄，為我的同胞提供更確切的訊息。[3]

在這本粵海遊記裡，作者利用與當地民眾直接接觸收集到的第一手資料，探究南粵居民生活的各個方面，詳盡地描述了當地的風俗習慣和居民的行為舉止。觀察對象包羅萬象，從富商到苦力，從老人到小孩，從黃埔港的買辦到珠江河上的疍家女，從梨園戲子到江湖郎中，從麻風病人到鴉片煙民。其所到之處遍及廣州西關街巷裡的各種商鋪、河南郊野寺院、花地苗圃園林、茶商豪宅庭院、黃埔村落墓地，以及珠江口外的香港和澳門。作者以其細膩的筆觸和浪漫的情懷，勾畫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南粵市井風情寫生。他對珠江風物充滿詩情畫意的描述尤為動人：

> 廣州城以東最有特色的景致，是莊嚴地聳立在江邊的兩座優雅的寶塔。[4] 這些見證中國古代偉大成就的建築物，給人以深刻印象。仰望這些古塔，就算是最冷漠的人，也不會無動於衷。特別是當夜幕降臨之時，江面上的帆影漸漸模糊不清，晚風吹拂着岸邊長長的蘆葦，皎潔豐盈的月亮從寶塔背後升起，塔身沐浴在銀色的月光之中。身臨其境，一種神秘的敬畏之感油然而生。這種美的感受，會留在每一個遊客的記憶之中，難以忘懷。[5]
>
> 月明之夜，美麗的景致在朦朧的月色中顯得更加柔和，一切污泥濁水都隱藏在夜幕中。寧靜的城市，在夜色中比任何時

* 何思兵，獨立學者，邁阿密大學歷史學博士。

圖 1. 琶洲塔，羅伯特・艾略特繪於 1830 年，載 Robert Elliot, *Views of the East*, London, 1833.（圖片來源：http://visualizingcultures.mit.edu/rise_fall_canton_04/cw_gal_01_thumb.html）

> 候都更為賞心悅目。沉睡的船隻，在陰影下逐漸從視野中消失，就像巨幅油畫中運用透視效果所描繪的景致，充滿活力而又安詳。月黑之時，由停泊在江面上的小艇形成的水上街道上，懸掛着一排排燈籠，在黑夜裡熠熠生輝，就像在湍急的河流上閃爍的點點繁星。江面上有時會傳來節慶的喧鬧聲，但隨着燈光一盞接一盞熄滅，聲音便漸漸消逝。到午夜時分，萬籟俱寂，忙碌了一天的蜑民都在奔騰的珠江上進入夢鄉。[6]

一個半世紀以來，替分尼的粵海遊記被廣為閱讀和引用，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直到最近，這本遊記仍然被西方學者用於早期中美關係史、廣州對外貿易史、廣州近代城市建築史、港澳史以及中國園林藝術的研究。[7] 可是，相比之下，鮮有中文著作引用這部遊記。筆者認為，缺乏中文譯本顯然是原因之一。要讀懂這本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文遊記，對於二十一世紀母語非英語的讀者來說，並非易事。再加上這位青年作者似乎為了炫耀自己的學識，不厭其煩地徵引莎士比亞、彌爾頓、柯勒律治等多位經典作家的作品以及各種宗教和政治歷史人物典故，又沒有註明出處，因此，增加了閱讀的難度。

替分尼出生於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一個商人家庭，其父是最早在美國南部開設棉紡廠的巴爾的摩商人之一，家境想必相當富裕。替分尼於 1840 至 1842 年入讀哈佛學院，雖然沒有完成學業，但是能考進新大陸最高學府的青年，無疑是天之驕子。在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大部分領土還是蠻荒之地，即使在最發達

的東海岸地區，上過中學的人仍然很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更是鳳毛麟角。[8] 替分尼在其著述中，顯示出他飽讀詩書，接受過良好的西方傳統人文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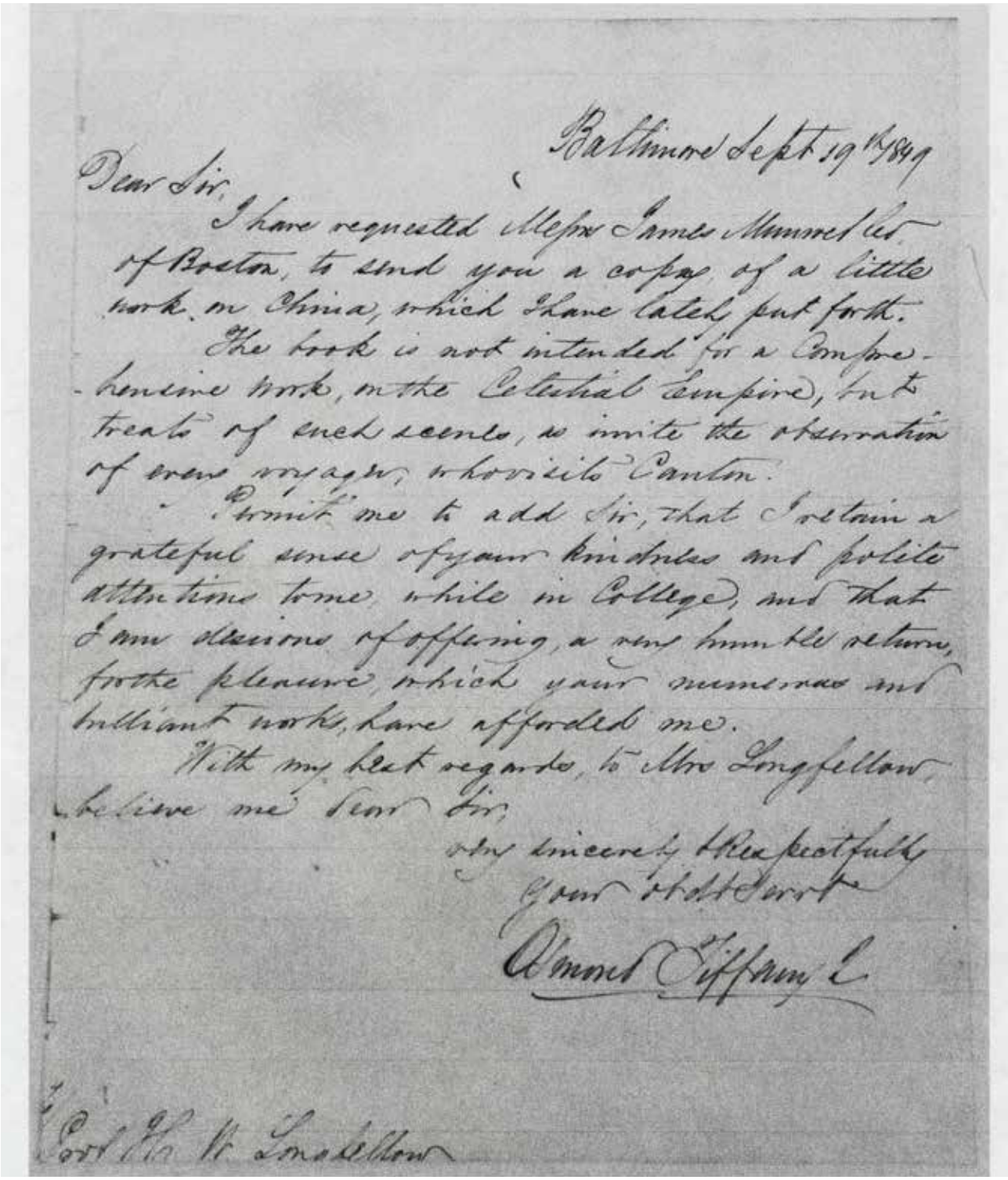
關於替分尼的生平，我們所知不多，美國早期作家詞典對這位作者只有寥寥數語的簡介。筆者最近發現，在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 (Houghton Library) 的郎費羅文檔中，保存着替分尼致郎費羅的十五封未刊書信手稿。[9] 這些書信顯示，他在哈佛師從現代語言教授郎費羅（Henry W. Longfellow, 1807–1882）。郎氏是十九世紀最負盛名的美國詩人之一，在歐洲也享有盛譽。他的名作《人生頌》早在清代同治年間就被翻譯為中文。錢鍾書先生認為，這是“漢譯第一首英語詩”。[10] 替分尼離開哈佛後，繼續與業師保持聯繫，不時請益。郎氏曾經向出版社推薦替分尼創作的歷史小說，對其弟子提攜有加。[11]《廣州的中國人》出版後，替分尼馬上讓波士頓的出版社把此書寄給在哈佛任教的郎費羅，以感謝業師的悉心教誨（參見圖2）。[12] 此書展現的浪漫主義文風，顯然深受郎氏於 1835 年出版的歐洲遊記《海外朝聖之旅紀行》的影響。[13]

在西方，十七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被稱為“壯遊時代”（The Age of the Grand Tour）。英國上流社會的年輕人，尤其是青年貴族，盛行到法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大陸國家漫遊。他們在巴黎、羅馬、佛羅倫薩、威尼斯等歷史文化名城憑吊古典與文藝復興時代的古蹟，觀摩歐洲傳統文化藝術，聆聽古典音樂，在西方文明的發祥地汲取精神養料。這種“壯遊”通常歷時數月至數年，在此期間，英國的青年精英可以深入了解歐洲各國的社會政治、文化藝術和時尚習俗，結交當地的名門望族，為未來的事業打通人脈，建立國際網絡。十八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14] 在其歐陸遊記中稱，海外遊歷是英國紳士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壯遊”實際上成為英國上流社會精英人才教育體制的組成部分。[15]

美國雖然早已脫離英帝國獨立，但是在文化教育上，仍然亦步亦趨，唯英國馬首是瞻。“壯遊”的風尚，也蔓延到美國。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社會精英和富家子弟，也以遊歷歐洲為傲。替分尼在其著述中，也顯露出他曾經遊歷過英國和歐陸國家。他的中國之行，可以看作是繼歐洲遊歷之後的又一次“壯遊”，也屬於歐美上流社會精英教育的一部分。他在介紹羊城風物時，每每聯想起歐洲，對英國和歐陸國家的歷史文化地理如數家珍，似乎有意炫耀他曾經遊歷過那些國家，顯露出崇尚歐洲文化的情結。同時，他也導誘國人將視野擴展到東亞，強調到中國遊歷，對美國青年的教育是很有意義的：

> 一心想要造就子女成才的父母，如果讓一些早熟的年輕人遠航到中國，考察那裡令人敬畏的事物，他們必將獲益匪淺。無論年齡多大，這樣的旅行，從各方面來考慮，都是很有價值的。[16]

遊記是西方文學的一個特殊的文類。在十九世紀西方殖民擴張的巔峰時期，海外遊記盛極一時，擁有眾多讀者。[17] 地理大發現、航海技術的進步和海外殖民擴張，使得西方人有更多機會到海外旅行。他們在海外的所見所聞，與本國的政體、科技、文化、藝術、宗教和習俗都迥然相異，引起遊歷者的極大興趣。他們的記述也吸引了眾多無緣遊歷的讀者。在電訊和照相技術尚未運用於傳媒的早期全球化時代，這些遊記很受渴望開闊眼界的讀者的歡迎。於是，這種特殊的文類，便大行其道。1850 年以前出版的有關中國的記述著作，僅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就藏有上千種之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英國的 Chadwyck-Healey 出版社發行的一套縮微膠片叢書，收錄了七百多本西方人士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撰寫的關於十九世紀中國的書籍，其中不少是遊記。[18] 研究全球化時代東西方交流史的西方學者，已經對十九世紀的海外遊記進行了大量的研究。[19] 早期歐洲人遊歷亞洲，對歐洲的社會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西方學術界對這一過程已經有精深



Baltimore Sept 19th 1849

Dear Sir,

I have requested Messrs James Munroe & Co. of Boston, to send you a copy of a little work on China, which I have lately put forth.

The book is not intended for a comprehensive work, on the Celestial Empire, but treats of such scenes, as invite the observation of every voyager, who visits Canton.

Permit me to add Sir, that I retain a grateful sense of your kindness and polite attentions to me, while in College, and that I am desirous of offering, a very humble return, for the pleasure, which your numerous and brilliant works, have afforded me.

With my best regards, to Mrs Longfellow, believe me dear Sir,

Very sincerely & respectfully
Your obdt Servt

Samuel Wells Williams

Prof Hon H. W. Longfellow

圖 2. 替分尼 1849 年 9 月 19 日致郎費羅函手稿，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藏，編號：MS Am 1340.2 (Box 58: 5551)。（圖片來源：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提供掃描件，筆者複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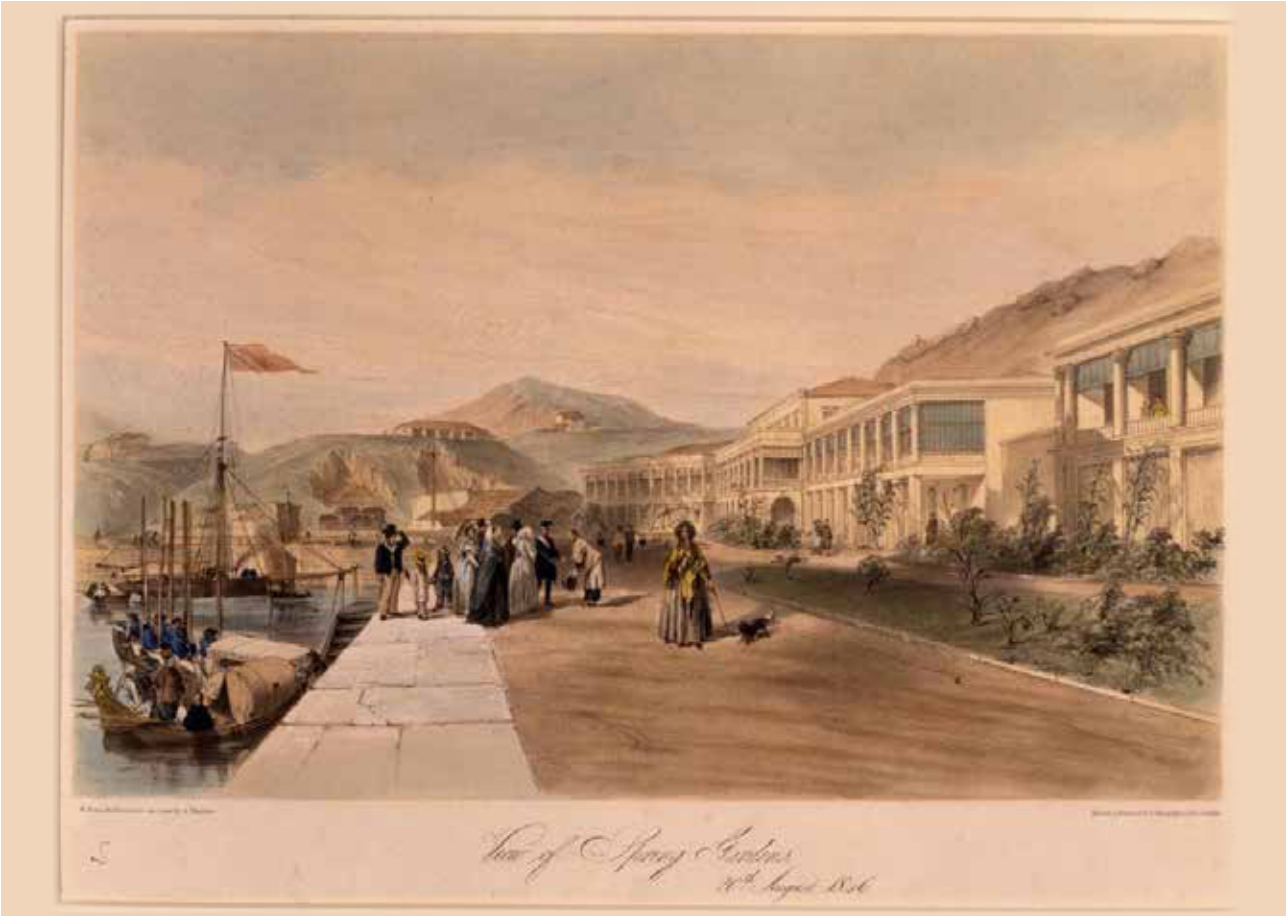


圖 3. 香港春園，佚名畫師繪於 1846 年，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藏。（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pring_Gardens,_Hong_Kong.jpg）

的研究。[20] 有關早期中美交往中的中國物質文化對美國社會產生的影響，美國學者也作過深入的探討。[21]

十九世紀西方人士撰寫的海外遊記的特色之一，就是大都含有天方夜譚的成分。如《廣州的中國人》的內容，就帶有相當濃厚的浪漫色彩。作者在結尾寫道：

> 在阿拉伯神話裡，花之中央王國是充滿魅力的土地。雖然我沒有愛上中國公主，然而，很多像阿拉丁神燈的精靈所展示的那些神奇景象，老是浮現在我的腦海裡。[22]

為了吸引讀者，這些海外遊記或回憶錄往往着重獵奇性和趣味性，充滿異國情調，引人遐想。作者在據其經歷作海外奇談時，會有意無意地誇張事實，或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甚至向壁虛構。對這些具有天方夜譚色彩的遊記，文史研究者不可當作考察實錄來讀。特別是對敘述中之文學成分，必須仔細檢視，不可想當然地作為史料來使用。

此外，遊記作者在文化或情感觀念上的傾向性或偏見，往往會對其觀察的結果產生影響。他們寫下的所見所聞和所感，也會為當時的社會思潮所左右。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以其對中國文化的豐富想像力，熱情稱頌

古老的中國文明，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但是到十九世紀中葉，隨着與中國直接交往的增多，西方人逐漸看透了這個老邁腐朽的帝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人對戰敗的中國更加鄙夷。然而，這部粵海遊記的作者卻是個異數，他仍然對中國文明持樂觀的肯定態度，高度尊崇孔子，他寫道：

> 誕生於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是位真正偉大的人物。他對中國宗教和法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給這個國家帶來了信仰和道德規範，一直沿襲至今。他活到高壽之齡，雖然在生前目睹了他所宣導的學說被人唾棄，卻垂名於身後。人們最終為其立廟，以祭祀他的功德，現存的孔廟有兩千多座。在孔子的誕生地，其後裔至今仍享有尊榮。孔子的聲名遠播，無與倫比，就像沙漠中的巨大金字塔一樣屹立在世界上，是名震寰宇的唯一中國人，為普世民眾所熟知。[23]

替分尼還不遺餘力地反駁西方人士對中國的種種責難和譏諷。他認為，中國人“充滿活力，努力進取，而又恭順平和”。可是“長久以來，中國人的所有禮儀舉止、風俗習慣、語言服飾，甚至情感都成為西方人的笑柄。其實，這些譏諷極為膚淺……中國人經常被說成只會仿造別人的產品。我不禁要詰問：他們究竟模仿了誰的產品？印刷、火藥和航海羅盤都是他們發明的”。[24]

由於作者懷有明確的傾向性，這部遊記不可能是“客觀”的。例如，替分尼在遊記中稱，“中國人殺嬰的報導，在我看來，大部分是彌天大謊。至少，我在中國期間，沒有在河面上看到過嬰兒的屍體”。[25] 在我們今天看來，當時溺殺女嬰的現象，是不容置疑的。據人口學者的研究，1700 至 1840 年間在北京出生的滿洲貴族女嬰，有十分之一被溺殺。在平民中，“溺女”的陋俗就更為嚴重。[26] 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關於中國人溺嬰的報導，主要出自早期來華的傳教士之手，他們不可能獲得任何統計數字去證實他們的報導。其實殺嬰的現象，並非中國獨有。在同一時期的歐洲和美國，殺嬰和棄嬰的嚴重社會問題也同樣存在，可是殺嬰卻被一些西方人士渲染為中國人特有的惡行。[27] 替分尼對中國人民懷有特殊的感情，而對傳教士沒有甚麼好感，所以根據自己的觀察，把傳教士的報導視為謊言。他在觀察這一問題上的偏差，是可以理解的。

替分尼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堅持獨立思考，以批判的眼光去審視西方權威人士的論斷，不人云亦云。當時很多西方人渲染中國人的骯髒和不良衛生習慣，但是替分尼卻着重描述了船工早上起床後洗臉、刷牙和刮舌苔的文明衛生習慣。[28] 無獨有偶，同一年到澳門談判簽訂第一個中美條約的美國公使顧聖 [29]（Caleb Cushing, 1800–1879），在日記中也寫下了與其他西方人士截然相反的觀察。他認為，他所見到的中國人比同一階層的英美人士更為乾淨。顧聖是替分尼的哈佛學長，同樣具有敏銳的批判性觀察能力。他自稱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對中國的觀察與眾不同，往往語出驚人。例如，顧聖比較中國女子纏足和美國女子束胸的陋俗，認為纏足並不比束胸更荒謬，只不過令纏足者不舒服而已，而束胸對女子造成的危害則更大。[30]

顧聖率領的美國使團是在 1844 年 2 月到達澳門的，經過四個多月的交涉，顧聖與欽差大臣耆英於 7 月 3 日在澳門城外的望廈村簽訂了《中美五口貿易章程》。[31] 當替分尼在 9 月底到達中國時，顧聖已在一個月前離開澳門回國。廣州此時進入了英美主導的自由貿易時代，舊行商貿易制度已被廢除。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州仍然是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雖然香港開放為自由貿易港，但是很多美國船仍然繞過香港，直接到黃埔和廣州貿易。從 1784 年到 1842 年，大約有兩千名美國商人在廣州居住過。從 1830 年第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到達廣州，到 1844 年間，美國基督教新教教會共派出 19 名傳教士到廣州傳教。1837 年，

圖 4. 從主教山俯瞰澳門，佚名華人畫師繪於 1870 年。（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anoramic_View_of_Macau_from_Penha_Hill.jpg）

在廣州和澳門有 37 名美國商人和 4 名美國傳教士，到 1842 年在穗港澳地區的美國男性增加到 49 人，他們代表着 11 個商行和幾個傳教機構。當時，美國在華的四大商行為旗昌洋行、瓊記洋行、同孚洋行和嘩地瑪洋行。旗昌洋行是在華的第二大外國商行，其地位僅次於英商怡和洋行。據《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刊載的統計，1844 年初在華外國居民共 462 人，主要居住在廣州、香港、澳門和上海。其中英國人最多，共 192 人，其次是美國人，有 76 人。此外，還有巴斯人、法國人、意大利人、丹麥人、瑞典人、荷蘭人、阿美尼亞人、葡萄牙人、瑞士人、普魯士人、比利時人、西班牙人和秘魯人等多國僑民。英、美、法等國家在廣州設有領事館。[32]

儘管廣州已經開放為通商口岸，由於一些滿清官吏暗中煽動，廣州紳民在鴉片戰爭後一直強烈抵制外夷入城，外國人仍然只能在城外西關一帶居住和經商，所以替分尼的遊記沒有任何關於廣州城內的記述。雖然根據剛剛訂立的條約，美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以及在通商口岸地區旅行的權利，但是替分尼等人在河南郊遊時，仍然遭遇到當地鄉民的騷擾。不過從他的記述可以看出，當時在十三行附近的西關地區，外國人與廣州商民的關係還是融洽的。

中英《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簽訂後，儘管鴉片仍然是違禁品，但是清政府對鴉片貿易視而不見。英美商人在治外法權的保護下，肆無忌憚地向中國輸入鴉片。以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為首的英國商人在廣州貿易中佔絕對優勢，美商旗昌洋行和瓊記洋行分別與這兩家英國商行在鴉片貿易中密切合作。替分尼對鴉片貿易的觀察，也顯示出他特立獨行的精神：

> 如果你告訴英國人，中英戰爭是由鴉片問題引起的，那是白費口舌。但是毫無疑問，鴉片是戰爭的主要起因。[33]

他又毫不諱言地指責他的同胞所從事的不光彩的交易：

> 英國人並不是販賣鴉片的唯一外國人。巴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樂於此道，被視

為模範共和主義者的美國人也不例外。很多速度最快的鴉片船掛着美國旗，它們在向天朝帝國輸入毒品的貿易中起着重要作用。[34]

販賣鴉片的人同時也在出賣他的靈魂。鴉片商人與向酒鬼兜售蘭姆酒的販子是一丘之貉，都是為了誘使癮君子掏出最後一文錢。更有甚者，鴉片販子把中國人視為可被肆意掠奪的對象。他們打定主意，不管中國人願意與否，都必須接受這種誘人的毒品，並為此付出白花花的銀子。[35]

替分尼在澳門水域目睹了武裝鴉片船的走私活動：

在澳門錨地碇泊時，看到一艘全副武裝的雙桅船以大約兩節的航速駛來，以飛快的速度超越我們後，在錨地下碇，然後鳴炮。這艘船的船頭沒有船名，起初以為是美國政府的雙桅船。甲板上佈滿水手，從他們收帆的速度和精確度來判斷，這是一艘軍艦。不過隨後得知，這是一艘鴉片飛剪船，配備有 20 門重炮和相當數量的水手。[36]

飛剪船載着致命的毒品在中國海岸遊弋，一發現機會便下碇，與那些等待誘餌的中國人交易。交易時，一箱箱鴉片搬到甲板，讓買家驗貨，交付銀子。看銀師仔細鑑別每一塊銀子，用尖鐵釘戳進銀錠，檢驗銀子的成色。成交後，貨物搬上靠在船舷的小艇運走。飛剪船繼續尋找下一位顧客。如果碇泊的地點好，上鉤的人多，鴉片船會停留幾天。要是官府的船隻來干擾，並對飛剪船的生意顯示出過分的好奇，飛剪船上的炮口便會打開，以示警告。鴉片飛剪船有時生意非常好，在中國沿海遊弋幾個月後，便可以載回一艙上好的銀子。[37]

位於虎門以外珠江口的伶仃島，曾經是無可救藥的鴉片走私販子的巢穴。在那裡，他們肆無忌憚，一點都不擔心會被查獲，被送上天堂或其他地方。他們覺得，幹這些對抗官府的勾當，其樂無窮。不過現在大多數鴉片躉船碇泊在黃埔，鴉片販子不再在伶仃島安營扎寨了。停泊在黃埔的幾艘躉船裝備精良，儲存着大量鴉片。這些船當然也武裝到牙齒。飛剪船在前往沿海地區兜售鴉片前，都從這些躉船取貨。[38]

在煙館裡，他直接觀察到進入迷幻狀態的吸食者，他們“臉色蒼白，神情癡呆，魂不附體”：

在昏暗的燈影下，這些悲慘的煙民就像太平間裡的屍體那樣恐怖。但是，鴉片產生的最強烈的效果，並非表現在吸食者的身體狀態上，而是表現在它可以使人陷入虛妄的狂想之中。受害者吸入一定劑量的鴉片後，他的意識似乎游離體外，變得非常敏感，感覺飄離了地面，在空中展翅翱翔。

在幻覺中，他會脫離其謙卑的地位、樸實的鄉土和溫馨的家園，感到自己威力無窮，可以在通往尊榮的坦途上輕鬆地飛奔，把對手遠遠拋在背後；財富和權力在向他招手，達官貴人與他攜手同行。他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錯，住的是宮廷御園，享盡話本小說裡描述的榮華富貴。

幻境中，他所擁有的宏偉殿堂裡傳出天籟之音，聖賢齊集為他歌功頌德，絕色美女簇擁左右。他半似仙人，不再貧窮、卑微和被人鄙視。豐盛的筵席上，熱酒斟滿了閃亮的杯盞，他起立歡迎在通往榮耀的道路上的落伍者，以勝利者的姿態對其手下敗將表示撫慰。

不過，如果他再往前走一步，便會步

圖 7. 澳門南灣，佚名華人畫師繪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藏。（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iew_of_the_Praya_Grande,_Macau,_unknown_artist,_Guangzhou,_China,_c._1830,_oil_on_canvas_-_Peabody_Essex_Museum_-_DSC07303.jpg）

> 履踉蹌，天旋地轉，他的競爭對手、賓客、樂師和貴人，以及所有的幻覺，頓時煙消雲散。黎明時分的寒意冷卻了發熱的頭腦，使他回到陰冷的現實之中。幻覺中所見的一切，原來只是個黃粱美夢，他仍然是以前那個無名鼠輩。他打了個寒戰，疲憊衰弱，無限惆悵，徒勞地企圖尋回消失了的幻覺，久久未能釋懷，整天精神渙散，無法振作起來幹他的營生，懶散地陷入無限懊悔之中。可是當夜幕降臨，他又去尋找令他沉淪的“女魔法師”，身不由己地接受她的誘惑。[39]

替分尼的描述，與美國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 1812–1891）的回憶錄《番鬼在廣州》大相徑庭。亨特聲稱，他旅居穗港澳40年，從來沒有發現濫用鴉片的跡象，“在廣州的外國人難得見到一個因抽鴉片而身心受損的人”。他還寫道：“與英美人士喝烈酒造成的惡果比較，抽鴉片的危害是微乎其微的。”[40] 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到亨特是旗昌洋行的股東，而這個美國在東亞最大的商行是通過走私鴉片致富的，就不難理解為何他罔顧事實，為毒品貿易辯護了。儘管替分尼下榻於旗昌洋行，並受到鴉片商人的熱情款待，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對美國人捲入鴉片貿易的譴責。

這部遊記記述的是一位具有批判性思維的

美國青年對十九世紀中國的獨立觀察，其價值不僅僅是提供了一些粵港澳歷史資料。他的觀察不可能是全面的，其中既有真知灼見，也有偏見和謬誤，但是通過分析其跨文化反思的開放心態，對理解十九世紀美國多元文化以及美國人對中國的認知，會有所啟迪。我們可以看到，在殖民主義時代的帝國主義文化氛圍裡培養出來的美國青年精英，也不是千人一面，萬口一腔的。

替分尼對英國殖民者在香港欺壓華人的胡作非為，也極為反感。他寫道：

> 中國人在香港蒙受諸多侮辱。對當地的無賴惡棍當然應該懲罰，並應該經常將他們置於軍警強而有力的監管之下。但是在香港的那些卑劣的英國浪蕩投機者，卻利用一切機會來侮辱華人，連循規蹈矩的良民也不放過。
>
> 來自倫敦周邊地區的罪犯和無賴之徒，僥倖逃脫了被流放到澳大利亞博特尼灣[41]服刑的厄運，卻在維多利亞城[42]裡對當地居民作威作福。那裡的華人大多數都是值得尊重的居民，聲譽比那些英國佬好得多。
>
> 曾經混跡倫敦瓦平碼頭[43]的卑賤無業遊民，三四人並排在香港的大街上大搖大擺，橫行霸道，將老實的行人用手肘搡到一邊，稍有怨言，就動手打人。[44]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香港開放為自由貿易港，逐漸取代廣州和澳門，成為華南對外貿易中心和南北貿易轉口港。[45]替分尼敏銳地觀察到這個自由貿易港的經濟前景：

> 香港很可能在數年後成為英國的貿易中心。它的地理位置適合發展貿易，又易於防守。幾乎在任何風勢下，船隻都可以進出港灣。在進入港灣的狹窄航道上，進犯的船艦片刻便會被炮火擊沉。英國人明智地採取了開明的政策，開放香港為自由貿易港。葡萄牙人在澳門則採取不同的政策，為了制衡英國勢力，他們在取消某些關稅的同時，又增加另一些關稅。因此，國際輿論都傾向於讚譽英國殖民地。[46]

替分尼對澳門的觀感，與很多十九世紀來華的美國人的感受相似。他初訪這座伊比利亞格調的古城，就被其浪漫氛圍所吸引。他描述對澳門的第一印象稱：

> 澳門有很多與那不勒斯相似的景色：美麗的海灣點綴着綠色的小島，弧形海灘的兩端有聳起的山丘，從碼頭往上延伸的山坡上，矗立着各式各樣的房子和其他建築物。不過澳門沒有迷人的皇家別墅，也看不到歐洲城市裡常見的華麗馬車。這個瀰漫着浪漫情調的中葡樂園，呈現出神秘的衰落景象，整個地方看不到正常的社會生活情景。
>
> 澳門的浪漫氛圍有其歷史地位的因由。昔日強悍的葡萄牙人，如今已經淪為一幫衰弱的可憐蟲。幾個世紀以來，澳門是歐洲人在中國沿海唯一的據點，中國政府容忍他們在那裡生存。這些葡萄牙人活在被放逐的詩人賈梅士的詩歌和榮耀之中，伴隨着他們的是天主教信仰和修道院清脆的鐘聲。在古老家族的豪宅裡，掩映着以木格子裝飾的墨綠色遊廊和禁止外人進入的誘人庭園。在這些幽深的庭園裡，他們過着悠遊自在的日子。[47]

替分尼也注意到："澳門的葡萄牙人是從果阿[48]遷移過來的，他們將宗教裁判的狂熱精神帶到澳門，中國人對他們沒有好感。"[49]兩個月後，替分尼重遊澳門，對當地的獨特風情做了更為細緻的觀察：

> 澳門的外觀沒有一點中國城市的特徵，弧形的海灘，以及半島上的山丘和城市建築，倒是與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非常相

似。在日落時分，微風從海面上吹來，當地居民都到海灘上平坦寬闊的碼頭散步消遣。遊歷過氣味難聞的廣州和暴發的香港以後來到這個平靜的地方，會有一種安寧的感覺。這裡的居民可以不受本地人的風俗和敵意的影響，享受純粹的歐洲生活方式。

澳門的房子很多都相當大，屋內有寬敞的廳堂和富麗堂皇的樓梯，屋前的陽台頗具神秘感。澳門的一些居民在這種豪宅裡過着優裕的生活。沿着碼頭有一些古老的宅第，從略微打開的大門，可以瞥見裡面絢麗的花壇、幽深的庭園和以綠色木格子裝飾的遊廊。澳門是想像中外觀最為浪漫的城市。在中國的城市寓居一段時間後，這種幻覺可能變得更加強烈。這個城市孤獨的氣息和古老的氛圍引人入勝。

在中國，一切事物都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洪荒時代。而在澳門，那些飽經滄桑的古舊建築距今僅僅幾個世紀。澳門的居民看起來跟那些建築物一樣與世隔絕和怪異。在白天他們都不見蹤影，只有在傍晚他們才出門，在海灘悠閒地逛蕩。穿着傳統服裝的葡萄牙女人睜着黑眼睛，顧盼陌生的旅人。

他們大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人物，很多是沒落的古老家族的後裔，卻像彌爾頓筆下的路西法[50]那樣自傲。這些男人相當懶惰，女人則無事生非。他們的白天在瞌睡中度過，到夜幕降臨才出現在街頭。落魄潦倒、憤世嫉俗的人會發現，澳門最適合他與世無爭的心境和離群索居的意願，我找不出另一個地方更適宜這種人安家的了。

澳門城裡有很好的道路，你可以越過關閘，在沙灘上騎馬，繞過當地人的城堡，從綠色的高地上遠眺海灣。

賈梅士洞設有祭祀這位葡萄牙詩人的神龕。如果你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我有必要告訴你，他是葡萄牙人值得驕傲的唯一詩人。據說他在那裡看着洶湧的波濤，寫下了《葡國魂》。如果有人膽敢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就會被當地的葡萄牙老居民咒罵。果真如此的話，這位詩人曾被放逐到那個地方，不過現在的地貌不知道與他活着時是否一樣，不管怎樣，他的情感已經流入他的詩篇之中了。

位於澳門城後半部的華人居住區，是個骯髒的貧民窟，幾乎沒有人認為值得遊覽。山脊上分佈着一些高牆環繞的莊園，裡面有精心栽培的大型園林，青草滿園，樹木繁茂。房子裡寬敞的房間通風良好。這些幽僻寧靜的莊園是澳門最美麗的景點之一，我在到訪澳門期間有幸能住在其中一處。那是一座古老家族的房產，其中富麗堂皇的大廳可以與里斯本的宮殿媲美。這座豪宅位於山頂，從蓋有大陽篷的涼台上，透過隨風搖蕩的樹林，可以看到山下的城區，也可以遠眺閃耀着藍光的廣闊海灣。在花園上方的峭壁上，一座廢棄的修道院聳立在空中。白天，百葉窗擋住了熾熱的陽光，微風吹進大廳，屋內相當涼快。當太陽在絢麗的彩霞中落下時，暮色籠罩着夜空。海水無情地沖刷着半月形的海灘，發出音樂般的悅耳聲響。[51]

替分尼的粵海聞見錄刊行距今已逾一個半世紀，然而他所描述的昔日南粵風貌，讀來依舊活龍活現，令人神往；他對中西交往史事的評論，仍然擲地有聲。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向學術界推介這本遊記，並將該書有關粵港澳風土人情以及鴉片貿易的部分內容節譯出來，與讀者分享。[52]

註釋：

1.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2. 1862 年，《美國人在中國》與小說《榆樹鄉的海倫與娥瑪》合在一冊出版，參見：Cora Mayfield, Elmwood, or, Helen and Emma; Osmond Tiffany, Jr., *The American in China, or Their Customs and Manners,* Boston: 1862.
3.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viii.
4. 作者描述的應是赤崗塔和琶洲塔。
5.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32.
6.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38–39.
7. Patrick Conner, *The Hongs of Canton: Western Merchants in South China 1700–1900, as Seen in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London: English Art Books, 2009; John Haddad, *America's First Adventure in China: Trade, Treaties, Opium, and Salv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ibing He,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 Macao: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2015;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Johnathan A. Farris, *Enclave to Urbanity: Canton, Foreigners, and Architecture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Bianca Maria Rinaldi, ed., *Ideas of Chinese Gardens: Western Accounts*, 1300–186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8. 根據 1840 年人口統計，美國在校學生中，小學生佔 91.1%，中學生佔 8.1%，而大學生僅佔 0.8%。見 George Tucker, *Pro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opulation and Wealth in Fifty Years, as Exhibited by the Decennial Census*, Boston: Little & Brown, 1843, p. 145.
9. Osmond Tiffany's Letters to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MS Am 1340.2 (Box 58: 5551),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0. 錢鍾書：《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錢鍾書集・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第 154–188 頁。
11. Henry Longfellow to Osmond Tiffany, Jr., 23 September 1858, in *The Letters of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edited by Andrew Hile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vol. 4, p. 97. 除了《廣州的中國人》，替分尼還出版了長篇小說《勃蘭頓：一個世紀以前的美國殖民地故事》（*Brandon; or, A Hundred Years Ago: A Tale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New York: Stanford & Delisser, 1858）、人物傳記《威廉斯將軍傳略》（*A Sketch of the Life and Services of General Otho Holland Williams*, Baltimore: J.Murphy & Co., 1851），以及他編撰的《基督教人物傳記與歷史》（*Sacred Biography and History*, Louisville, KY: Bill, 1860）。
12. Osmond Tiffany, Jr. to Henry W. Longfellow, 19 September 1849, MS Am 1340.2 (Box 58: 5551),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3. Henry W. Longfellow, *Outre-Mer: A Pilgrimage Beyond the Sea*, New York: Harper, 1835.
14. 吉本著有《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六卷。
15. See James Buzard, "The Grand Tour and After (1660–1840)", in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7–52; Anthony Burgess and Francis Haskell, *The Age of the Grand Tour*, London: Elek, 1967; Jeremy Black, *The British and the Grand Tour*, London: Croom Helm, 1985.
16.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52.
17. Roy Bridges, "Exploration and Travel Outside Europe (1720–1914)", in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7.
18. John Lust,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in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Bamboo, 1987;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oks on China, Cambridge: Chadwyck-Healey, 1995.

19. See Steve Clark, ed., *Travel Writing and Empire*, New York: Zed Books, 1999; Peter J. Kitson, ed., *Nineteenth-Century Travels, Explorations, and Empires: Writings from the Era of Imperial Consolidation, 1835–1910*, 4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20. 代表作為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3 vol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1993.
21. A. Owen Aldridge,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aroline Frank, *Objectifying China, Imagining America: Chinese Commodities in Early Americ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22.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271.
23.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83.
24.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265–266.
25.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9.
26. James Lee, Wang Feng and Cameron Cambell,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Implication for Two Types of Positive Check", *Population Studies-A Journal of Demography* 48, no. 3 (1994), pp. 395–411; 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bell,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5–70.
27. Josephine McDonagh, *Child Murder and British Culture, 172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ichelle T. King,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6–7.
28.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248.
29. “顧聖”是美國公使 Caleb Cushing 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清朝官員在給皇上的奏摺裡改寫為“顧盛”。不過，他們在致美方的外交文書上仍用“顧聖”一名。
30. John M. Belohlavek, *Broken Glass: Caleb Cushing and the Shattering of the Union*,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4.
31. 關於第一份中美條約的簽訂與早期中美關係，可參閱何思兵：《治外法權與非正式帝國：中美〈望廈條約〉研究述評》，《澳門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97–105 頁；Sibing He,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 Macao: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2015.
32. Curtis T. Henson, Jr., *Commissioners and Commodores: The East India Squadron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p. 4; 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1837–1846: Prelude to Hong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25; "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no. 13 (January 1844), pp. 3–7; "List of Foreign Consuls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no. 13 (January 1844), p. 9.
33.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72.
34.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74.
35.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69.
36.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70.
37.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71.
38.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178–179.
39.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171–172.

40. William C. Hunter,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Paul Trench and Co., 1882, p. 49.
41. 博特尼灣（Botany Bay）位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是當時英國罪犯的流放地。
42. 當地華人稱這一地區為“四環九約”。
43. 瓦平碼頭（Wapping Dock）位於倫敦瓦平地區泰晤士河岸，曾經是處決海盜和走私犯等海上犯罪分子的行刑地點。
44.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257–258.
45. 參閱何思兵：《香港與十九世紀美國對華貿易》，《文化雜誌》（中文版）2016 年總第 98 期，第 43–56 頁。
46.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261.
47.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17–18.
48. 果阿（Goa）位於印度西海岸，1510 至 1961 年期間為葡萄牙佔領。
49.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 18.
50. 路西法（Lucifer）是英國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名著《失樂園》（*Paradise Lost*）中的墮落天使。
51. Osmond Tiffany, Jr.,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James Munroe, 1849, pp. 261–263.
52. 由筆者翻譯的《廣州的中國人：一位美國旅人對天朝帝國的觀察》已列入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組編的“西方文獻中的近代廣州”譯叢（“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即將出版。